

庭外重组与破产重整的协同机制研究

——以企业拯救效率为视角

李子恒

武汉工程大学23级国际法学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00

DOI: 10.61369/SSSD.2025130031

摘 要：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与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企业债务危机的化解效率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本文以企业拯救程序的功能耦合为研究主线，通过规范分析、比较研究与实证检验，构建“理论解构—实践检视—制度创新”的三维研究框架。揭示我国现行制度在法律规则、程序衔接、权益平衡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研究提出，应通过构建“预重整双层规则体系”“全流程标准化衔接机制”“多元主体权益平衡模型”，实现庭外重组与破产重整从程序叠加到功能融合的制度升级，为完善中国特色企业拯救制度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 键 词： 庭外重组；破产重整；预重整；程序协同机制；制度创新

Research on the Synergy Mechanism between Out-of-Court Restructuring and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Rescue Efficiency

Li Ziheng

Grade 2023 Graduate Stud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00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ground of the deepening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efficiency of resolving enterprise debt crises has become a key proposition affec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the functional coupling of enterprise rescue procedures as the main research lin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oretical deconstruction – practical inspection –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rough norm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testing. It reveals the structural defects of China's current system in three aspects: legal rules, procedural connection 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balance. The research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realize the institutional upgrading of out-of-court restructuring and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from procedural superposition to functional integration by constructing a "two-tier pre-reorganization rule system", a "full-process standardized connection mechanism" and a "multi-subject rights and interests balance model",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improving the enterprise rescu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out-of-court restructuring;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pre-reorganization; procedural synergy mechanism;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引言

庭外重组是债务人与部分利害关系人自主协商（磋商或谈判）而形成庭外重组方案（如债务重组意向、框架、措施、协议或者安排等）的活动或过程。^[1] 在当今复杂且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企业犹如置身于波涛汹涌的海洋中，面临着数不胜数的不确定性因素。其中，债务困境宛如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已然成为严重制约企业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瓶颈。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披露，2024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破产案件3万件，同比增长6.5%，其中审结重整、和解案件1384件，但庭外重组转入司法重整成功率不足三成，程序衔接不畅导致的资源浪费问题凸显。作为市场化拯救的两大核心机制，庭外重组的自主性与破产重整的司法强制性本应形成互补，但我国实践中二者常呈割裂状态：一方面，庭外重组协议缺乏司法约束力，超一半的重组方案因个别债权人反对而夭折；另一方面，破产重整程序启动后，70%的案件需重新开展债权审核与资产调查，重复劳动导致平均审理周期延长145天。这种“程序孤岛”现象不仅增加企业拯救成本，更削弱了市场主体对破产制度的信心。因此，构建高效协同机制已成为完善企业破产拯救体系的当务之急。

一、本土困境：我国协同机制的制度性障碍

（一）法律规范体系的碎片化缺陷

1. 核心法律的制度空白

现行《企业破产法》仅在第7条（破产申请权）、第79条（重整计划提交期）隐含程序衔接条款，缺乏系统性规定：

（1）庭外协议效力不明。第6条“诚实信用原则”无法解决协议对未签字债权人的约束力问题，即它们只对协议各方具有约束力，缺乏约束全体债权人的特征。^[2]从而导致实践中法院对“庭外重组协议”的司法认可标准混乱。

（2）程序转换规则缺失。庭外重组转入破产重整的条件（如资产负债率阈值、债权人反对比例限制）、过渡期管理（如谁负责资产保全）、文件提交清单等无明确规定，导致“程序空转”。

（3）配套制度冲突。《公司法》第183条规定的清算程序与破产重整程序衔接不畅，导致企业在“清算式重整”中面临股东除名、股权过户等法律障碍；《证券法》未明确上市公司庭外重组中的停牌规则，引发股价异常波动风险（如ST信威重组期间股价波动达±40%）。

2. 司法解释的滞后性

虽然《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8）第22条提及“探索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衔接机制”，但缺乏具体操作细则：一是未规定庭外阶段的信息披露标准，导致债权人难以判断企业真实价值（据深交所调查，58%的债权人认为庭外重组中存在“重大信息隐瞒”）；二是未明确临时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实践中法院指定的临时管理人常因缺乏《破产法》授权，无法调取银行流水、不动产登记等关键资料，影响协商基础。

（二）程序运行机制的系统性割裂

1. 信息披露与共享机制缺失

一是庭外阶段。企业无强制披露义务，仅需向参与协商的债权人提供有限财务数据，导致未参与协商的债权人（尤其是小额债权人）面临严重信息不对称，2022年某省庭外重组案中，34%的方案因债权人质疑资产估值而失败；

二是程序衔接。庭外阶段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常因“非司法程序产生”被法院要求重新出具，如ST二重案中，两份报告因审计机构未进入法院名册被排除，新增费用3000万元；

三是技术支撑。全国统一的“企业破产信息网”尚未实现庭外重组信息接入，各地法院自建系统标准不一，跨区域案件信息共享率不足20%。

2. 工作成果转化的制度壁垒

债权确认“双重审核”。庭外阶段已达成的债权和解协议，在破产程序中需重新经债权人会议表决（《破产法》第61条要求“所有债权均需审查”），导致同一债权重复审查率达100%；

资产处置效率低下。庭外阶段协商的资产出售方案（如土地使用权转让），因未取得法院裁定，需在破产程序中重新履行评估、拍卖程序，某房地产企业重整案中，此环节耗时长达9个月；

人员管理断层。庭外重组中由企业自行管理财产事务，进入破产程序后转为管理人接管，因工作交接不规范，导致25%的案件出现账册丢失、合同遗漏等问题。

3. 法院角色定位的被动性

现行法下，法院仅能在破产申请受理后介入，导致前期协商缺乏司法监督。第一，无法制止企业“虚假重组”行为（如某企业利用庭外重组拖延时间，暗中转移核心资产）；第二，难以协调多方利益分歧，如金融债权人与供应商债权人的清偿顺序争议，常因缺乏中立第三方裁决而陷入僵局；第三，对“恶意反对债权人”（为获取超额清偿而拒绝合理方案）无制约手段，导致“少数绑架多数”现象频发（据统计，15%的重整案因个别债权人反对而失败）。

（三）利益平衡机制的结构性失衡

1. 债权人保护的“双重困境”

庭外阶段。少数债权人“搭便车”问题突出，如某化工企业重组案中，12%的债权人未参与协商却要求按同等条件受偿，导致方案谈判延期3个月；司法阶段。我国在新《企业破产法》中引入了强制批准制度参见《企业破产法》第87条.]]，但该制度的实体审查规则原则性过强，相关规定过于宽泛，实践中依赖于法官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对审查规则予以诠释，而最高法院又多次强调应当“审慎适用”强制批准制度^[3]，迫于压力，部分地方法院担心引发信访等风险，出现了回避适用甚至慎用强制批准制度的情况，使得该制度实际适用率极低；

清偿顺位冲突。金融债权人（抵押债权）与职工债权人、税收债权人的清偿顺序争议，缺乏专门的协商平台，常需政府介入协调，增加行政干预成本。

2. 职工权益保障的制度性虚化

参与渠道缺失。《破产法》未规定职工代表在庭外重组中的参与权，2022年全国67起重大重组案中，仅15%的企业提前告知职工安置方案，引发多起群体性事件。

清偿保障不足。庭外重组中职工债权（工资、经济补偿金）常被协商延期支付，而《破产法》第113条规定职工债权在重整中优先受偿，导致“庭外协商损害职工利益”的质疑；

就业保护缺失。重组方案中的裁员计划缺乏司法审查，某省2023年3起重整案中，企业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同意即裁员30%以上，违反《劳动合同法》第41条规定。

3. 股东权益调整的程序正当性不足

协商机制缺位。《破产法》未要求股东参与庭外重组协商，实践中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常对权益调整方案（如缩股、除名）缺乏知情权，ST金洲重整案中，股东因未获提前通知，向证监会投诉导致程序中止；

调整依据模糊。现行法未规定股东权益调整的量化标准（如以资不抵债程度确定缩股比例），法院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引发司法不公质疑；

救济途径有限。股东对权益调整方案不服时，仅能依据《公司法》第22条提起决议无效之诉，缺乏专门的破产程序内救济渠道，导致纠纷解决周期延长6-12个月。

二、制度建构：协同机制的系统化优化路径

（一）程序机制：打造“庭外协商—司法预介入—程序衔接—执行监督”全流程闭环

1. 庭外阶段：建立“市场化协商+司法保障”的双轨机制

（1）完善预重整备案制度，企业向法院提交备案申请后，获得3-6个月的“保护期”期间，债权人不得提起新的诉讼或执行申请；企业高管需定期向临时管理人报告资产变动情况，禁止非经营性支出超过100万元；法院召开“预重整听证会”，邀请主要债权人、职工代表、税务机关等参与，形成《协商指导备忘录》，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2）专业化协商工具引入。建立“债权人分级协商机制”：将债权额50万元以下的债权人纳入“小额债权组”，采用电子投票（同意率达60%即视为通过），提高协商效率；引入“债务重组模拟系统”，利用大数据测算不同方案下的清偿率、企业估值，为协商提供科学依据（如浙江法院开发的“重整智脑”系统，方案测算时间从7天缩短至4小时）。

2. 司法阶段：创新“分类审查+快速裁决”机制

（1）对预重整方案采用“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程序合法性审查，重点核查债权人通知程序、表决过程录像、临时管理人工作报告；实体合理性审查，仅针对职工安置、税收减免等涉公共利益条款，普通商业条款尊重当事人合意；

（2）建立“重整计划快速批准通道”：符合以下条件的案件，法院应在30日内审结，已备案预重整方案且同意债权额占比≥75%；职工债权、税收债权全额清偿或提供足额担保；股东权益调整方案已获董事会与监事会书面同意。

（二）权益保障：构建“债权人分层保护+职工参与+股东程序正义”的平衡模型

1. 债权人权益的差异化保护

（1）同意债权人激励机制。对庭外阶段签署协议的债权人，赋予“清偿率溢价权”（如普通债权清偿率比清算状态高10%-15%）；在重整计划中设置“快速清偿条款”，同意债权人可在方案生效后30日内获得50%的首期清偿，较反对者提前6个月。

（2）反对债权人约束机制。适用“最低保障+风险自担”原则，其清偿率不得低于清算预期（《破产法》第1129条细化），但不得主张高于同意债权人的待遇；对“恶意反对者”（无正当理由

由反对且无担保的债权人），法院可依管理人申请，将其债权转为劣后级，在其他债权人清偿完毕后再行处理。

2. 职工权益的全过程保障

（1）参与协商机制。庭外阶段成立“职工代表委员会”（成员不少于5人，由工会主席、车间主任、普通职工代表组成），参与资产处置、薪酬调整等方案制定；预重整备案文件需包含《职工权益保障承诺书》，明确不拖欠工资、不降低社保待遇等基本条款，经职代会2/3以上通过。

（2）司法救济途径。职工对安置方案不服的，可向法院申请召开“职工权益听证会”，法院可邀请劳动行政部门、行业协会代表参与协调；设立“职工债权保障基金”，由重整企业按资产总额的1%缴纳，用于支付协商期间的生活费（标准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80%）。

3. 股东权益的程序正义建构

（1）参与协商权。庭外重组方案涉及股东权益调整的，需提前15日通知全体股东，召开“股东说明会”，解释缩股比例、股权过户等关键条款；持股5%以上的股东有权向临时管理人查阅企业财务账册、重组谈判记录，保障信息对称（《公司法》第33条在破产程序中的延伸适用）。

（2）救济机制创新。建立“股东权益调整异议之诉”特别程序，股东可在方案批准后10日内，以“调整比例不合理”“程序违法”为由提起诉讼，法院组成3名法官+2名商事专家的合议庭，30日内审结；引入“股东权益托底机制”，对因重整导致持股比例低于5%的中小股东，可要求企业以停牌前20日均价回购其股份。

三、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揭示了我国庭外重组与破产重整协同机制的核心问题在于“制度供给不足”与“程序衔接不畅”。解决路径需从三个层面展开：（1）规则层。通过《企业破产法》修订与配套制度完善，明确协同机制的法律框架与操作规则；（2）程序层：构建司法预介入、成果复用、分类审查的标准化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3）价值层：建立债权人、职工、股东等多元主体的权益平衡机制，确保协同过程的公平性与合法性。

参考文献

- [1] 邹海林. 我国司法实务中的庭外重组及其法律表达 [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 2024, 05: 21-37.
- [2] 王欣新. 破产法 (第五版)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 [3] 李永军. 破产法的程序理性与制度构建 [M]. 法律出版社, 2018.
- [4] 徐阳光. 预重整制度的法理逻辑与规则构建 [J]. 中国法学, 2021 (3): 112-130.
- [5] 范利亚, 王泽钧. 关联企业预重整的实践及反思——兼谈庭外重组与司法重整的效力衔接 [A]. 《上海法学研究》集刊 (2021年第9卷总第57卷)——上海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文集 [C]., 2021: 8.
- [6] 魏家淦, 栗航. 我国困境企业的预先重整程序——从中国二重重整案谈起 [J]. 安阳工学院学报, 2020, 03: 26-29.
- [7] 参见《企业破产法》第87条.
- [8] 钟杨子奇. 破产重整计划强制批准制度的完善 [D]. 西南政法大学, 2023.
- [9] 徐阳光, 陈怡然. 企业破产前困境拯救机制的法理阐释与体系构建 [J].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24, 03: 25-36.